

微观观察与媒介理论的有机结合 ——评《边缘身份融入：符号与传播——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调查》

戴 哲

一、引言

随着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乡村经历了一定的挫折和困难,农民逐渐沦为社会结构中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正如沃伦斯坦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说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一个不平等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包括现在的中国,都处在这一体系的边缘,在一定意义上是受剥削的一方;在中国内部,城市——乡村则又是一种不平等的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按同一逻辑,复制了国际上的不平等结构。”^[1]在这一不平等结构中,乡村/农民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为不能发声的客体事实上已经沦为中国国内的“东方”与“第三世界”。而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变,以及农民工在城市的边缘处境是这一现状的显在表征。

“农民工”这个概念本身便包含着“边缘化”的意味:非农民,但却也并不具备城市人的身份;不得不离开乡村,却又无法融入城市。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处境更加边缘和尴尬。因为他们在“城市文化”的影响下成长起来,外表和生活习惯与城市青年并无多大区别,他们没有太多关于“乡村”的概念,也并不打算回到乡村。^①他们正是吕途所言的“第三代打工者”——“大都没有种过地,很多都是在城市里出生和长大,他们对土地和农村没有真正的认同,希望在城市落脚生根”^[2]。在这个意义上,“身份认同”和“融入城市”对他们而言变得极为重要和迫切。伴随户籍制改革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农民工落脚城市已获得越来越多的便利,但是成为“城里人”在非制度层面而言,仍然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边缘身份融入:符号与传播——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调查》^②的作者对此有着深刻的洞见,所以其以此作为出发点和问题意识,试图打破以往的研究框架,从研究视角和方法论的维度上进行突破,让人耳目一新。

二、微观观察的方法与对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领域的探索

一般意义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多倾向于从宏观层面、“他者”立场和外部关系出发,主要侧重于对相关政策和制度进行讨论;当然,也有一部分研究者,试图从微观层面探究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建构:譬如潘毅在《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性的形成》中,通过深入工厂对女工们(新生代农民工)展开田野调查,发现女工们的尖叫、梦魇、疼痛等,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被扭曲的“主体”正在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进行着抗争,这种抗争并非主流因而不被关注,但却预示着“新兴打工者的主体”形成的可能。虽如此,此类研究却并不以探寻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在非制度层面进行身份认同和城市融

^① 老一代的农民工多指20世纪7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农民工,他们当过农民,会种地,只是季节性到城市打工,他们始终认同农村为自己的归宿,老了一定会回到农村。

^② 该书由学者袁靖华独立完成,由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次印刷出版。在对该书的评论中,我都将使用“作者”这一称谓,并将该书简称为《边缘身份融入:符号与传播》。

入的路径和方法作为主要目的。^①而《边缘身份融入：符号与传播》的作者试图填补现有研究的空白，从“社会融入”出发，以“微观观察”作为方法，进入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领域，寻找隐藏在其中的诸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的障碍；与此同时，作者又另辟蹊径，将“传播”纳入进来，以其作为独特的社会观察视角，对社会议题进行重新讨论和研究。即重点在传播理论与媒介实践层面考察媒介与弱势群体的关系，探究媒介的传播活动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建构的重要性，并以此寻找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深度行为意识层面融入城市的思路和路径。

基于此种目的和方法，微观观察与媒介理论的有机结合紧密勾连始终贯穿在本书的整个架构中。暗藏在新生代农民工日常生活领域并影响其社会融入的因素和阻碍，在作者看来是指社会行动的内在推动力——社会心理与身份认同，包括情感态度、思想观念、心理意识、价值判断、人格素养等非制度因素。它们常常以符号障碍和符号资本的分配不公等形式出现，并诉诸于一系列情绪：尊重、歧视、愉悦、愤怒等，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层面上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因此，通常的宏观研究的方式并没有办法对其进行有效把握。正因为此，作者在研究中采用了微观观察的方法，以进入新生代农民工暧昧而又幽微的日常生活领域。

对于在身份和阶层上与新生代农民工本身便有所“区隔”的研究者而言，“微观观察”——深入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领域显然并非易事。为此，作者在具体的论述展开之前，对研究对象——在浙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田野调查——以抽样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为主，获得了许多详尽而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得以在著作中揭示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层面所遭遇的却常常被遮蔽的不公，以及潜藏的情感心理危机：工作的不稳定性、权益的受损害、居住条件边缘化、青春期情感需求、日常生活中的苦闷、孤单、压抑乃至受歧视感等等。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它们导致了在户籍制改革日趋推进的今天，身处城市并试图成为城市人的新生代农民工日益加剧的“身份焦虑感”。第一手的资料能够还原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处境，勾勒出底层边缘群体的生活图谱，使作者的“观察”更加具体和真实。不仅如此，在本书绪论的开头部分，作者特别提及自己与两位“打工者”同住一间病房的经历，因为这段经历，使得她还可以以相对于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更加自然和亲近的方式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状态，并感受其内心世界。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促使其选择从“非制度性因素”入手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心理融入问题。由此可见，在某种意义上作者的微观观察实际还融入了自身的“生命体验”在其中。

三、传播学视角的采纳与对新生代农民工传播行为的关注

如果说微观观察只是确认并进入具体的研究对象和范畴的方式与中介，那么，对于“传播学”视角的采纳则是《边缘身份融入：符号与传播》的论证得以展开的关键，也是本书的精妙之处。从传播学出发，结合媒介理论，探究作为社会学重镇之一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这一话题，无疑是一种创新，同样也是势所必然。面对现代媒介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个体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与各类媒介的传播活动有关，生活在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例外。那么，当经由“微观观察”进入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世界，为传播学视角找到立足点之后，具体而言如何将媒介理论与微观观察进行有机结合，媒介的传播活动如何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成为更加重要的问题。

在书中作者主要关注了新生代农民工三个层面的传播行为：人际传播、网络传播和大众传播，探究传播对人的身份认同的具体作用及其影响机制，从而进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建构和社会融入极为重要的微观领域即非制度层面。在对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传播”的研究中，作者通过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与人（尤其是所在城市的本地人）交往的情况，揭示了他们遇到的关系障碍、语言符

^① 当然，这也与研究者的角度和关注点不同有关，潘毅一直致力于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并试图发掘隐藏在处于被剥削阶层的打工者身上的反抗力量。

号排斥等问题,其认为这些包含在人际传播过程中的符号与媒介障碍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所在城市的重要影响因素。正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了“城市边缘人”的心理危机,而又因为这些影响因素发生于日常生活领域,所以更容易被忽视;反过来,这些因素却也可成为促成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意识层面融入城市的重要途径。而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传播”逐渐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城里人”的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和媒介。某种意义上,新生代农民工又可以被称为“网络人”,与城市青年一样,他们是在互联网的影响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同时又因为互联网天然具有的“平等性”,因此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主体性建构与“网络传播”进行勾连成为可能。在此部分中,作者主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媒介传播、网络交流、媒介知识与现代媒介素养,以及该群体以此为中介所进行的自我表达与现代人格塑造,从而探究其是否具备主体意识的觉醒、通过自我书写重构自我身份的可能性,正如“关注以网络、自媒体等为代表的新兴传播媒介作为符号生产与聚集之地建构并影响社会变迁中的群体身份的重点途径”^[3]。在“大众传播”这一部分,作者则从符号资本论的研究视角出发,重点考察符号的主要聚集生产地——大众传媒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讨论经由大众传媒所建构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形象和相关叙述,对该群体内在的身份建构的影响,并揭示了阻碍该群体融入城市生活的重大符号资本障碍。

四、与传播媒介紧密关联的社会融入模型的建立

事实上,作者从微观层面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揭示该群体在非制度层面——日常工作生活方面所遭遇的不公,并极具洞见地将此观察与传播学视角进行结合,其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建构一个新的社会融入模型。在本书的最后部分,作者结合此前的论述,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包括关系维度、心理维度、媒介维度、认同维度四个维度在内的社会融入模型。其中,关系维度主要侧重对新生代农民工在人际交往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测量;心理维度则被作者用来对新生代农民工在所处的城市所感受到的疏离感、孤独感和无归属感等情绪进行测量;媒介维度则用来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其所在的城市中对媒介符号的使用与传播情况;而第四个维度——认同维度在作者所建构的社会融入模型中显然是重点,用来测量新生代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认识。经由认同维度所得出的影响因素,实则与前三个维度紧密相关——正如作者通过该模型所发现的,在新生代农民工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微观领域,各类人际关系障碍、语言符号障碍、情感心理缺失障碍、主动传播的媒介素养等,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城里人”身份进行认同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之上,作者认为,可以从这些因素出发,在制度和政策所不能到达的日常生活领域,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城市边缘群体的社会融入和对所在城市自我认同的身份融入。

显然,该著作所提出的社会融入模型的四个维度,皆与传播媒介有着紧密的关联,而此模型也正是作者基于传播学视角所得到的新发现,更是一种为适应当前现代媒介城市,因而以同样作为现代媒介城市的主要参与者——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考察对象,从而重新建构起来的全新的社会融入模型。在作者看来,各类传播媒介已成为现代信息社会的黏合剂,在促进社会整合、构建社会认同等方面承担着主要职能。因此,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在非制度层面的身份认同和城市融入这一话题的研究,必须将“传播”纳入进来以作为研究的特定视角。在此意义上,这个新的社会融入模型是对微观观察与媒介理论或传播学视角有机结合的最好体现。

还应该指出,该书非纯理论的著述,包含了很多实证研究的内容。但因为其涉及对许多重要的话题和概念的讨论,譬如身份认同、符号资本、传播媒介等,所以,对于理论的阐释必不可少,并成为其展开具体论述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在著作的前两章,作者开展了传播学与社会学、符号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交叉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重点立足身份研究、媒介正义论、符号资本论、符号互动论等来建构其研究的理论框架。正如在对“身份认同”这一对于全书都至关重要的概念和理论的论述中,作者首先在理论层面梳理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符号学、文化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多学科关于身份

认同的研究,综合提炼出身份与符号、媒介、传播的关系,为之后的论述建立了良好的立论基础。而正是作者通过对多学科领域以往从事身份认同的研究所作的梳理,我们可以得见,本书理论框架的建构,是以多学科多维度交叉研究的融合视角作为基础的——不仅是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等学科也都被纳入进来,这无疑是对以往相关研究的理论架构的一种创新性突破。

五、结 语

通读全书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展开研究时总是试图跳脱那种站在“他者”的立场、纯粹罗列和归纳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因素的研究方式——那无疑是描述性的、更好操作的,对于研究对象本身而言并无更大的意义。作者选择在传播学这一特定视角下,结合媒介理论,以微观观察的方式深入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领域,寻找影响其在深度行动意识层面(包括情感态度、思想观念、心理意识、价值判断等)对城市进行认同和融入,对自我身份进行确认的阻碍和路径,从而使在户籍制改革和城乡一体化日趋推进的今天,却仍然处在边缘地位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处境和未来出路更加清晰。毋庸置疑,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城市融入而言,对于该群体真正从“不可见”变为“可见”、从“边缘”回到“中心”来说,“传播”与“媒介”的力量不可忽视,媒介对身份融入的符号建构力量显然是作者从传播学出发,将媒介理论纳入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微观层面的考察中去的主要原因。但显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初期关于“总体性世界”的想象中,所谓总体性的世界意味着存在一种正义的理念,这种理念可以落实到经济发展层面,换言之,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可以两全其美的。但随着改革的推进,为了经济的发展,公平、正义等最高层面的内容被悬置起来,现代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也由此产生,新生代农民工在当下的边缘处境便是重要的表现之一。所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的研究,不仅事关该群体的切身利益,更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建设这一现实紧迫议题。正如劳伦斯·弗雷所言:“接触那些我们社会中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匮乏资源的人们,并为之鼓与呼,……显示传播学对社会正义的敏感性。”^[4]显然,传播学研究对于社会正义的敏感性——这才是作者选择以“传播”作为视角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问题进行研究的更加重要的原因;与此同时,借由微观观察的方式,摆脱“他者”的立场,立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主体立场,进入该群体的日常生活领域,触碰其真正的内心状态,真实了解其各方面的匮乏,这也未尝不是对公平和正义的一种回应。因此,作者通过将微观观察与媒介理论有机结合所完成的这本论著,不仅在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意义上,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将传播学的研究与事关社会公平正义的议题关联起来,从而为当前本土传播学的实践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而从更高层面的意义上来说,《边缘身份融入:符号与传播》还是作者在当今社会中对公平正义的有力呼应。

参考文献:

- [1] 刘复生. 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的“主旋律”小说研究 [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47.
- [2] 吕途. 中国新工人: 迷失与崛起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3: 10.
- [3] 袁靖华. 边缘身份融入: 符号与传播——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调查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169.
- [4] Fery L R. et al. Looking for Justice in All the Wrong Places: On a Communication Approach to Social Justice [J]. *Communication Studies*, 1996, 47 (1): 110-127.

作者简介: 戴哲, 女, 助理研究员, 文学博士, 浙江传媒学院戏剧影视研究院。

[责任编辑: 赵晓兰]